

# 社会变迁、角色变换与城市青年女性住房获得

梁延润雨 吴开泽 郭圣莉\*

**【摘要】**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比例增加，打破了传统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别购买结构。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采用CFPS 2014年、2016年和2018年数据，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家庭少子化双重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变换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机制。中国的工业化和性别平等政策增强了女性的个体独立性，高等教育普及化增强了女性的职业和经济能力，少子化等家庭结构变迁改变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财产分配格局，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青年女性的住房获得。数据分析显示，个人和家庭禀赋对青年住房获得的影响显著。在住房产权获得上，技术精英和高收入青年女性具有显著优势，“独生子”和“独生女”具有优势，“非独生女”处于劣势，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个体和父辈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青年女性住房资产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论文从社会变迁和角色变化的角度解释青年女性购房现象，探究了住房市场变化的社会文化根源，建议政策制定者关注女性的个体化住房需求，并建立更加平等的住房权益分配和继承制度。

**【关键词】** 社会变迁 性别角色 青年女性 住房获得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22) 04 - 0055 - 20

## 一、引言

在传统东亚社会中，性别和家庭等级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背景下被制度化，家庭资产在继承及归属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以男性为主导的性

---

\* 梁延润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吴开泽（qqwkz@163.com），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郭圣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曾在第四届住房政策研究工作坊会议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工住房供应与保障机制研究”（18CSH056）。

别不平等状态 (Pascall & Sung, 2007)。住房是家庭财富的重要象征,住房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 (段塔丽, 2008)。住房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受传统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两个因素的影响。在传统性别劳动分工模式和“从夫居”的婚姻居住模式影响下,女性被视为“男性经济支柱模式”的从属,在获得住房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 (聂晨、薛嘉成, 2019)。父权制社会中的家庭性别角色与男性继承规范,导致女性在家庭住房资源代际传递时被“边缘化” (Kennett & Kamwah, 2010)。中国住房资源占有的性别不平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前表现为男性户主拥有房屋与宅基地的归属权和使用权 (李小云等, 2006),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后则表现为房地产市场中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购买结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包括与配偶联名的在内,2010年我国女性住房拥有率比男性低 29.2%。

近年来,男性作为购房市场主力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青年女性购房意愿增强、购房比例上升。城市女性购房市场整体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单身化、产权登记个人化现象,这种被称为“她需求”的女性购房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徐佩玉, 2019)。贝壳研究院 (2021) 数据显示,2020年购房者中女性占比高达 47.5%,女性购房者中 29 岁以下的占比 48.99%,一、二线城市女性购房比例逐渐趋同甚至超过男性。安居客 (2020) 调查数据显示,女性购房者中近四成为单身,且多以个人名义购房。从现实与传统的冲突角度来看,青年女性在购房市场异军突起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性别规范体系中的男性住房保有形式和路径,引发了关于社会与家庭文化机制变化的讨论 (李丽梅、杨澜, 2020)。现有的关于青年住房获得变化趋势的研究普遍采用性别中性视角,住房的性别视角研究仍然被学术界所忽视。尽管已有研究对女性住房获得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但对女性住房获得背后的社会性别文化机制仍缺少讨论 (聂晨、薛嘉成, 2019)。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等重大社会变迁对“80 后”和“90 后”等新生代的成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受益于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在自由、平等的社会氛围和富裕、丰富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社会代”,他们的自主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能够得到更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尊重,性别角色观念更趋于平等 (李春玲, 2019)。在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与女性家庭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结构变迁改变了住房等家庭财产分配格局。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从社会变迁和角色变化两个维度探究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机制,并尝试推动性别视角下的住房政策研究。

## 二、青年女性住房获得影响机制变迁

### （一）社会转型与性别分工变迁

社会转型不仅包含着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社会层面的城市化的变动，也意味着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和观念层面的理性化的转换（刘祖云，2006），这种全面的结构性变动逐步瓦解了传统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壁垒，改变了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社会对个体的性别角色期望和表现，使个体理解、维持并强化性别身份认同，进而导致社会行为预期和规范的差异（卿石松，2019）。

#### 1. 劳动性别分工的改变与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

劳动的性别分工深受社会形态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传统的自然劳动分工使男性在两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的劳动被限制在家庭或私人领域，形成了传统“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卿石松，2017）。这种男性拥有主导及支配权的一整套制度秩序、系统和文化体系，限定了女性在社会、家庭、家族中的依赖性地位（Eagly，1978）。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条轴线上重塑了影响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朱斌、李路路，2015）。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需求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杨菊华，2019），通过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教育、工作、政治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之中，如创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妇女解放话语和开展女性劳模运动以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实现“去性别化”的劳动分工（高小贤，2005）。政策环境和性别分工的演变推动了两性权力关系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领域中的父权制文化形成了冲击（金一虹，2010）。女性逐渐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参与以往被男性所控制的高技术含量和高薪工作，开始摆脱服从于男权的“客体”身份和“他者”身份，具有更平等的性别意识和独立的个体化意识（吴小英，2002）。

#### 2.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女性职业和经济能力的增强

长期以来，女性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的弱参与性和弱竞争性，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悬殊现象的产生，限制了“妇女的福利及其对生活的驾驭能力”（Becker，199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女性在本世纪前10年内上升了13%（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组，2011）。中国高校学生中女生占比58%，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位列世界第一，已经逐步迈向“高等教育女性化”阶段（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学历层次提升是女性经济实力上升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男性（Psacharopoulos, 2004），高学历女性更有能力挑战传统性别分工，规避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Dougherty, 2005）。

### 3. 婚姻关系弱化与婚姻制度功能性的减弱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家庭结构受到严峻挑战，独居、不育、离婚、单亲、同居等各种婚姻形式构成的多样化家庭占比逐渐上升（托夫勒，2006）。中国的婚姻制度、婚育、情感和性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对于双系抚养、保障性关系和生育合法性的制度功能性逐渐弱化（唐灿，2005）。民政部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的结婚率呈连续下降之势，初婚年龄普遍推迟，“80后”“90后”“00后”单身女性增多，除被动不婚外，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独身或晚婚。出于对自身主体性的追求，以及对因婚姻破裂而导致的女性丧失住房产权的现象的规避，越来越多的未婚女性通过婚前置业，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

## （二）生育政策与女性家庭角色变换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和子代性别结构具有重要影响，也促使女性的家庭角色发生深刻变化。

### 1. 家庭少子化与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家庭少子化是第一次人口转型的重要特征，教育的高投入使得养育子女的成本逐渐上升，夫妻基于理性的考虑会选择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以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人口变化趋势表现为人口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左右（於嘉、谢宇，2019）。人口政策亦是造成家庭少子化的原因之一，生育政策通过“控量-提质”逻辑，作用于家庭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使其呈现出家庭代数减少、子女数量锐减、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生命周期后移等多重特性（杨菊华，2017）。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规模从1981年的4.61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少子化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子女的珍贵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家庭的敬老伦理和代际交换模式。在中国传统价值和现实生活的共同作用下，亲子赡养关系并未从反馈模式让位给接力模式，而是形成了家庭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代际权利义务失衡的代际模式（马春华等，2011）。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家庭关系由“敬老”转向“重小”，由重赡养向重抚养模式流变（费孝通，1983），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向从原来的向上流动逐渐转变为向下流动。

下行亲子抚养关系的强化推动了养育模式从“散养”转向“精养”，依据“资源稀释理论”，同胞规模数的减小使家庭预算约束得以缓解，提升了子女可

获得的家庭资助水平（蔡禾、黄建宏，2013）。父母基于对子女获得高学历的期待，不断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显示，90%以上的父母期望子女受高等教育。受中国传统养育观念影响，父代视帮助子代购房与完婚为人生目标和代际义务，竞相增加对子女的住房资助，以提高其子女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Shang & Zhang, 2011）。从情感角度而言，家庭少子化增强了亲子间的情感依赖性，父母基于对“协商式亲密关系”的期待，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代际互助”，为子女提供包括现金资助和房产继承等各种形式的住房支持，甚至成为整个过程的发动者（钟晓慧、何式凝，2014；王晶、杨小科，2017），从而显著提升了青年女性在住房获得过程中的父代资助水平。

## 2. 子女唯一性与传统性别偏好弱化

多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向男性倾斜的性别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传统性别规范的认同与遵从（魏钦恭、张佳楠，2021）。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城市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子女的唯一性缩减了父辈对子女投资的性别选择空间，独生女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家庭传统性别偏好弱化的变迁模式呈现出以“被迫”为契机，渐向“自发”和“自觉”式演变的态势（郑筱婷、陆小慧，2018）。计划生育政策以独生女家庭的形式打破了父母培养子女过程中重男轻女的桎梏与性别刻板印象，改变了父母对女儿的角色期待，他们将原本寄予儿子的期望全都转向女儿，并鼓励女孩追求与男子相同的目标（Tsui & Rich, 2002），如希望女孩在性格上自强、有主见，在生活上兼顾家庭和事业，在教育期望上拥有尽可能高的学历层次（张艳霞，2006）。女孩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显著提高，性别间教育不平等呈现降低趋势（叶华、吴晓刚，2011）。

家庭结构和婚姻居住模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家族中男性具有家族住房财产“全面的继承期待权”，女性被排斥在财产继承的范围之外的代际交换模式（Kennett & Kamwah, 2010）。女儿在家庭代际传承中的功能性角色不断强化，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家庭实际的赡养责任和义务，并在原生家庭的经济、资源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唐灿等，2009），逐渐获得了家庭话语权与较高的家庭地位。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研究表明，传统的男孩家庭效用开始向女孩扩展，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逐渐弱化并出现性别平衡趋势<sup>①</sup>，女性的家庭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

<sup>①</sup>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城镇人口中，赞成“在儿女都尽到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女儿应该与儿子平等继承父母财产”的人数从2000年的44.6%上升至2010年的76.3%。

### （三）作为经济独立和资产传递的女性住房获得路径

在性别分工变迁与女性家庭角色变换的背景下，青年女性主要通过两种路径获得住房：住房资产重要性驱动下的女性独立购房，家庭支持集中和性别偏好弱化后基于家庭资产传递的女性住房获得。

#### 1. 住房资产重要性驱动下的女性独立购房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日益显著，城镇用地紧张和房价快速上涨，住房在居住属性基础上衍生出了投资（商品）属性（Clark et al., 1994）。过去20年来，中国城镇房价的上涨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尽管政府多次进行房价调控，但未能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反而出现“越调越涨”的现象，这使居民形成了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住房也成为城市居民最具投资价值的商品之一（吴开泽，2016；杨小科、王晶，2018）。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2020年年末住房资产占我国家庭总资产的比例超过74%，住房成为影响城市居民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魏万青、高伟，2020）。

随着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住房逐渐成为青年获得城市户籍的“硬标准”和扎根大城市享受公共服务的必备条件，凸显出住房的权利和归属属性（吴开泽、魏万青，2018）。不同类型和条件的房屋产权所附着的生活便利程度、公共服务权利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社会对住房的认同开始从经济资本扩展到符号资本，甚至成为青年衡量地位差异的重要标志（闵学勤，2011）。在城市户籍权利与住房产权挂钩的制度顽固存在等因素影响下，房屋所有权已被广泛视为一种社会规范或刚性需求（Wang, 2018）。

伴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深入，个体的教育水平、经济能力等个人禀赋因素对住房资源获得的影响日渐凸显（杜本峰、黄剑焜，2014）。婚姻关系弱化和女性单人户的比例上升促成了新的住房需求，性别分工变化以及女性经济能力的增强则为女性住房获得积累了物质基础。经济独立为女性住房获得积累了物质基础，她们能够在住房购置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性和投资决策话语权（王善高等，2019）。独立购房让青年女性通过投资房产更深度地参与经济活动，享受经济发展收益和附加在住房产权之上的公共服务权利。

#### 2. 家庭支持下的女性住房获得

随着城市房价持续性上涨，城市青年越来越面临着住房可支付性的巨大挑战（Yang & Chen, 2014）。新就业青年女性从市场中获得财富和进行经济积累的时间较短，家庭禀赋成为女性获得住房资源的重要影响因素（吴开泽、魏万青，2018）。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量”降低了家庭资源的稀释程度，家庭禀

赋在青年住房资源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力不断增强并逐渐大于自致性因素（湛鸿燕，2017）。家庭集中力量汇集资源支持子代购房，使得“房价收入比”“房屋租金”等房价衡量指标在中国失效（孙立平，2007）。房价飞涨与购房低龄化的现实情境印证了“住房啃老”现象的普遍化，加剧了青年群体住房获得中的先赋性不平等（Izuhara & Forrest, 2013；蔡禾、黄建宏，2013）。现有城市青年住房调查数据显示，约1/3的城市青年依靠父母资助解决住房问题（风笑天，2011），985高校毕业生中有68%需要依靠父母实现“住房梦”（朱迪，2012）。一线城市中父母资助青年购房的比例更高，广州“80后”家庭资助购房的比例为64.65%，如果把两代人共同拥有的住房视为家庭资助，家庭资助购房的比例达到80%（吴开泽，2016）；北京市青年有80%在购房时获得了父母的支持，其中28%由父母全额购置，52%在父母的支持下偿还房贷（杜本峰、黄剑焜，2014）。

“下行式”的代际资源分配增加了青年女性能够获得的家庭资源投入，独生女家庭结构是她们获得以住房为代表的家庭财富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子女的唯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男性系代际传承模式，压缩了代际间配置资产的性别选择空间，女儿获得了附属在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之上的家庭财产继承权。父母通过支持首付、直接提供住所、购买家具甚至给第三代购买保险等方式资助女儿购房。有研究显示，通过“父母资助”实现第一套住房的独生女比例比非独生女高12.45个百分点（钟晓慧，2015）。在住房成为家庭资产象征的背景下，独生女能够获得更集中的家庭经济支持，住房资源获得逐渐去性别化，房产市场中女性的购置需求日益凸显。

###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 （一）数据来源

论文采用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择城镇地区的青年调查样本为研究对象，分析青年女性住房资源的获得情况。综合父母可能出于对房产投资或家庭财富代际传递的考虑为未成年子女买房，以及年满16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户主的法律规定，论文将16~35岁的群体界定为青年。合并CFPS 2014、2016和2018个体和家庭数据，采用列删方法删除相关变量缺失值，剩余样本为6661份。

#### （二）研究变量

因变量包括住房产权与家庭人均住房资产。住房产权是根据当前住房的房

产证上是否有受访者的名字（无论是否联名），分为“有住房产权”与“无住房产权”两类。家庭人均住房资产为家庭住房资产净值除以家庭人口数。

自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禀赋和家庭禀赋两个维度。个人禀赋因素操作化为教育程度与职业类型。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四类。职业类型分为无业人员、普通工人、办事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五类（将职业 CSCO 码转为 ISCO88 编码）。家庭禀赋因素操作化为独生子女属性、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独生子女属性分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父辈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四类，选择父母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一方。世代分为“80后”和“90后”，考虑到“00后”样本整体年龄较小，将1990年以后出生的样本统一划分为“90后”。

### （三）模型和方法

首先，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住房产权获得，该模型的公式为：

$$\ln \frac{p(t)}{1-p(t)} + b_1x_1 + b_2x_2 + \dots + b_kx_k \quad (1)$$

式（1）中， $x_1, \dots, x_k$  是一组解释变量， $b_1, \dots, b_k$  是每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其次，由于较大比例城市家庭的住房资产为零，约占总样本的 16%（1065/6661）。住房资产变量属于非正态分布的受限因变量，考虑到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采用广义 Tobit 模型分析人均住房资产（周华林、李雪松，2012）。该模型的公式为：

$$y = \max(0, \beta'x_i + u_i) \quad (2)$$

式（2）中， $x_i$  是解释变量， $\beta$  是对应的系数。为分析组间系数差异，在分组回归后对需要进行组间比较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基于似无相关模型 SUR 的 Suest 检验（连玉君、廖俊平，2017）。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

定类变量	变量名称 及分类	全体样本 百分比 (%)	男性样本 百分比 (%)	女性样本 百分比 (%)
个人住房产权	无住房产权	89.99	88.40	92.15
	有住房产权	10.01	11.60	7.85
性别	男性	57.66		
	女性	42.34		
户籍状态	城镇	35.88	33.58	39.03
	农村	64.12	66.42	60.97

(续上表)

定类变量	变量名称 及分类	全体样本 百分比 (%)	男性样本 百分比 (%)	女性样本 百分比 (%)
地区	西部地区	22.64	22.42	22.94
	中部地区	28.66	29.18	27.57
	东部地区	48.70	48.40	49.11
婚姻状态	有婚姻经历	37.37	38.83	35.37
	无婚姻经历	62.63	61.17	64.63
世代	“80后”	35.54	40.31	29.01
	“90后”	64.46	59.69	70.99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2.16	46.56	36.12
	高中/中专	24.50	23.20	26.28
	大专	17.69	16.18	19.74
	本科及以上	15.66	14.04	17.86
职业类型	无业人员	34.59	35.55	33.27
	普通工人	41.24	43.12	38.67
	办事人员	6.65	6.27	7.17
	管理人员	4.44	5.49	3.02
独生子女属性	专业技术人员	13.08	9.57	17.86
	非独生子女	66.27	62.76	71.06
	独生子女	33.73	37.24	28.94
父辈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71.78	72.82	70.35
	高中/中专	20.94	20.60	21.41
	大专	5.27	5.07	5.54
	本科及以上	2.01	1.51	2.70
连续变量		全体样本 (均值/标准差)	男性样本 (均值/标准差)	女性样本 (均值/标准差)
年龄		24.97 (5.03)	25.55 (5.14)	24.18 (4.77)
	年龄平方/100	6.49 (2.53)	6.79 (2.62)	6.07 2.35
家庭人均收入		9.84 (1.02)	9.87 (1.01)	9.80 (1.03)
对数(万元)		15.94 (38.20)	15.52 (37.14)	16.51 (39.0)
家庭人均住房 资产(万元)		6661	3845	2816
样本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四) 描述性分析

表1分性别描述了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在个人禀赋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和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女性占比均高于男性。青年住房产权拥有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青年男性住房产权拥有率为11.6%,女性住房产权拥有率为7.85%。初中以下学历青年住房拥有率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青年住房产权拥有率性别差距显著减少[如图1(a)所示]。在拥有住房产权的女性群体中,未婚女性的平均年龄低于已婚女性[如图1(b)所示],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女性选择在婚前购置房产,而非仅仅通过婚姻与配偶共同拥有房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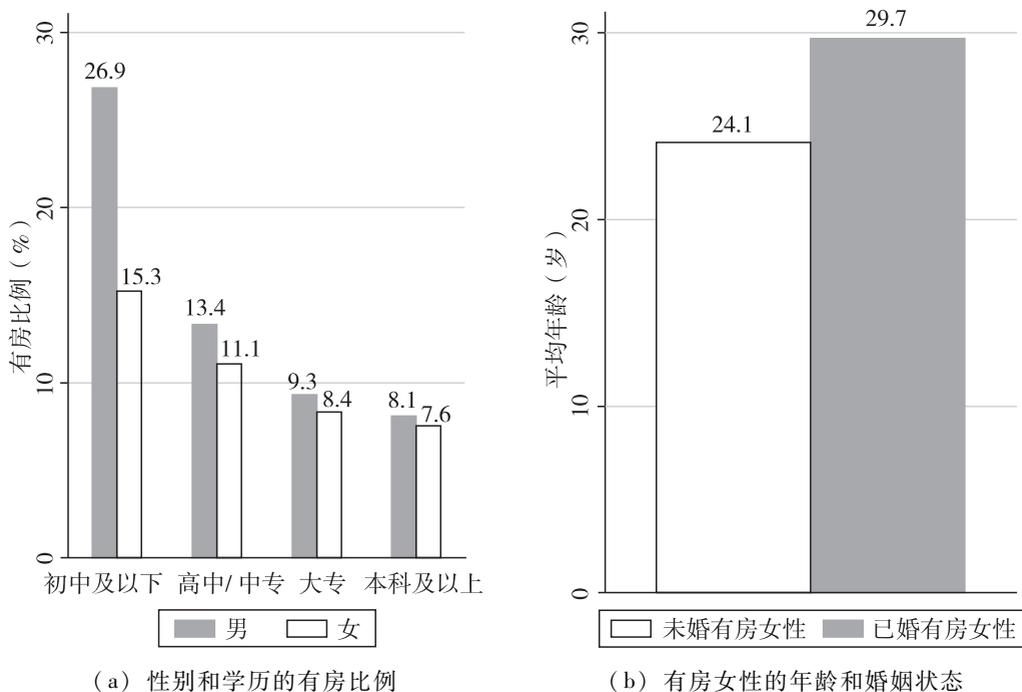


图1 住房产权获得状况的性别与婚姻状态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四、模型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部分主要考察个人禀赋因素和家庭禀赋因素对青年住房产权与资产累积的影响,使用分性别样本回归模型进行性别异质性分析,以解释青年女性的住房获得机制。

### （一）对青年女性住房产权获得机制的分析

青年的住房产权获得受到户籍制度与世代的显著影响。在房价快速上涨的环境下，“90后”在住房产权获得方面存在明显劣势，房价上涨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负向影响更大。表2模型3则显示，年龄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反映年轻女性在住房获得上更具优势，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她们购房时很可能获得了家庭支持。全样本模型显示，城镇户籍青年住房获得的优势明显，优比是1.2倍（ $e^{0.189}$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模型显示，城镇青年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影响系数大于男性。

全样本模型显示，高学历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具有显著优势，本科及以上学历组回归系数为0.398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模型显示，高学历男性住房产权获得的优势显著，学历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不显著。学历对女性住房产权的影响受到职业变量的调节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回归模型未引入职业类型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变量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职业类型变量后，本科以上学历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职业类型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技术精英女性组的影响系数为0.59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反映出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具有明显优势。学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女性的就业竞争力，缓解女性在就业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性别歧视（刘泽云，2004）。高学历也有助于女性获得专业技术类职位，促进女性实现经济独立与住房自有。

家庭禀赋对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显著。独生子女属性变量显示，子代唯一性对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全样本模型中独生子女性别属性变量影响系数显示，非独生子女住房产权获得的系数为0.275且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独生女和独生子女的系数分别为0.681和1.051，均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反映四类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即“非独生女”的住房产权获得处于劣势，“独生女”和“独生子女”在住房产权上具有优势。独生子女住房产权优势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资源稀释程度较低，在“子女唯一性”的结构性约束之下，父母在为子女住房投资时的性别选择空间较小，独生女作为唯一的代际互动对象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家庭的资助。

表2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独生子女属性等变量的基础上，父辈学历层次对男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显著，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不显著，但随着父辈学历层次的提升，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系数由负转正。家庭收入是青年住房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女性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系数为0.285且在0.01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男性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反映高收入家庭中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优势明显，家庭收入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大于男性。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差异性影响，反映了父辈对子女家庭角色的期待和财产继承规划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在婚房普遍由男方购买的中国传统观念中，父辈会将为儿子购买婚房视为增强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的重要筹码，尤其是高学历的父辈更重视通过资助儿子购房，以实现资产代际传递。因此，在传统性别偏好和家庭预算约束的共同作用下，家庭资源在代际转移时会优先考虑男孩需要（郑磊，2013），只有当高收入家庭成本预算限制得到缓解时，女儿才能获得在满足男孩需要之余的家庭资源的支持。

表 2 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世代（“80 后”为参照）			
“90 后”	-0.313 **	-0.239	-0.377
年龄	-0.046	0.090	-0.352 **
年龄平方	0.205	-0.057	0.815 **
有婚姻经历（无婚姻经历为参照）	0.622 ***	0.549 ***	0.775 ***
城镇户籍（农村户籍为参照）	0.189 *	0.146	0.224
地区（西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0.413 ***	-0.443 ***	-0.398 *
东部地区	-0.360 ***	-0.440 ***	-0.269
个人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0.170	0.112	0.258
大专	0.169	0.265	0.011
本科及以上	0.398 ***	0.438 **	0.351
职业类型（无业人员为参照）			
普通工人	0.318 ***	0.356 ***	0.208
办事人员	0.124	0.108	0.047
管理人员	0.313	0.308	0.364
专业技术人员	0.383 **	0.106	0.592 **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为参照）		0.770 ***	0.735 ***

(续上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独生子女性别属性 (非独生女为参照)			
独生女	0.681***		
非独生子	0.275**		
独生子	1.051***		
父辈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0.129	-0.079	-0.253
大专	0.214	0.470**	-0.366
本科及以上	0.452*	0.653*	0.224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0.153***	0.104*	0.285***
系数	-4.757***	-5.627***	-2.458
样本量	6661	3845	2816
Pseudo R <sup>2</sup>	0.1074	0.0918	0.1378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1、0.05和0.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二) 青年女性住房资产的差异分析

青年群体住房资产的世代差异明显,全样本和分样本模型均显示,“90后”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房价快速上涨导致购房“门槛”不断提高,“90后”需要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财富累积才能购房。年龄和年龄平方对青年男性住房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年龄对青年女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平方呈显著正向影响,这反映随着年龄增长,青年女性的住房资产累积呈现“L形”趋势。

个人禀赋对青年住房资产的作用力显著。表3全样本模型显示,高学历群体与职业精英的住房资产优势显著,分样本模型显示,男性办事人员与管理类精英的住房资产累积优势明显。学历提升对女性的住房资产累积具有正向影响,随着学历层次提升,女性组的影响系数由负向不显著转变为正向显著。教育作为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对女性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庭禀赋因素影响系数显示,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的青年女性更容易获得高价值的住房。全样本模型统计结果显示,非独生子女的系数为负,“独生女”和“独生子”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模型显示,“独生子”与“独生女”影响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父辈高学历的青年女性住房资产累积优势明

显,随着父辈学历层次从高中/中专提升至本科及以上,女性组的影响系数由不显著转为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父辈学历提升对女性住房资产累积带来的边际效应大于男性。家庭收入提升对青年住房资产累积影响显著,分样本模型显示,其对女性住房资产累积的影响大于男性,家庭收入每提升一个单位,女性住房资产比男性多提升2.088个单位(7.942-5.854)。由此可见,“男性优先”的家庭资源分配原则和家庭经济能力共同影响了青年子女的住房资产,家庭人均收入的提升对子女住房资产的影响呈现显著性别差异。当家庭收入提升后,女性获得了原本向男性倾斜的住房资源,从而呈现出比男性更高的边际效应。

表3 人均住房资产的Tobit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世代(“80后”为参照)			
“90后”	9.867***	9.804***	11.209***
年龄	-0.814	0.470	-3.253*
年龄平方	3.453	0.489	9.603**
有婚姻经历(无婚姻经历为参照)	-6.664***	-6.032***	-8.653***
城镇户籍(农村户籍为参照)	2.402**	3.035*	1.359
地区(西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1.970	-1.552	-2.214
东部地区	5.415***	3.959**	7.235***
个人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0.562	2.369	-1.866
大专	3.290**	2.894	2.869
本科及以上	13.259***	17.847***	7.053**
职业类型(无业人员为参照)			
普通工人	2.412*	3.213**	0.575
办事人员	8.485***	9.972***	5.184
管理人员	8.705***	11.326***	2.539
专业技术人员	1.466	-1.155	2.332
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为参照)		2.259	2.677
独生子女性别属性(非独生女为参照)			

(续上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全样本	男性分样本	女性分样本
独生女	2.508		
非独生子	-0.526		
独生子	1.408		
父辈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中专	1.409	-0.056	3.346
大专	3.641	3.239	3.619
本科及以上	15.234***	10.680**	18.832***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	6.789***	5.854***	7.942***
系数	-70.296***	-75.056***	-58.566**
sigma 系数	1580.328***	1491.643***	1682.256***
样本量	6661	3845	2816
Pseudo R <sup>2</sup>	0.0126	0.0128	0.0138
对数似然值	-29450.37	-16904.408	-12522.256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1、0.05和0.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五、结论与讨论

住房的机会和价值嵌入于结构化和制度化的性别关系之中,性别角色分工变迁与住房获得的性别分化有密切关系。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利用CFPS数据考察社会转型和角色变化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型对青年女性的生命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性别分工变迁重塑了性别观念,高等教育扩招、婚恋和性观念的变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和子女养育方式的改变等重要事件交织于她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形塑了更为平等和独立的女性角色。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比重增加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社会转型改变了劳动性别分工,女性能够通过劳动参与实现经济独立,进而形成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使青年女性能够在住房购置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性和投资决策话语权(王善高等,2019)。另一方面,人口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代际关系重心下移,降低了家庭资源的稀释程度,使子代在住房资源获得过程中能得到更集中的家庭支持。子女的

唯一性使父母对女儿的期待发生了较大转变，青年女性的家庭角色发生了本质变化。这使得家庭资产代际分配的“偏好系”发生了移动（魏钦恭、张佳楠，2021），住房产权获得逐渐去性别化，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需求增长。

CFPS（2014—2018年）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住房产权与住房资产获得存在显著的群体性差异，女性在住房产权获得和住房资产累积上均处于弱势。个体经济能力和家庭资助是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主要路径，个体经济能力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更强的边际效益，家庭收入提升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与住房资产累积的正向效应都显著大于男性。个人禀赋提升对女性住房产权获得有正向效应，意味着女性能够依靠后天努力克服住房获得的性别劣势，实现住房产权从无到有的跨越。家庭因素是住房产权与住房资产性别分化的主要原因。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是解释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关键机制。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住房获得优势上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囿于传统性别偏好与家庭结构，非独生女性处于最劣势地位。在市场化改革以后，住房选择行为往往属于家庭行为，家庭成员尤其是父辈所拥有的资本会共同作用于青年住房获得，独生女家庭的出现显著提升了女性的住房获得优势，因为独生女的唯一性使其从父辈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住房支持。

新时期青年女性独立购房的社会现象，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住房政策的调整具有政策意涵。长期以来，住房政策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将住房视为家庭成员共同的居住空间和资产，女性的家庭角色使得她们在住房财产的继承和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婚恋观念变化促成了家庭形式的多样化，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女性的家庭角色，这提示住房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关注个体化需求。当前大城市的购房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对非本地户籍的单身居民要求较为严格，这项政策忽视了单身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的家庭角色转换。在购房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中考虑单身青年的刚性购房需求，有助于青年女性在城市安居乐业。随着中国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型，未来的住房政策应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独生女家庭角色的转变，从而更好地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住房和资产继承的问题。青年女性独立购房现象改变了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购房行为，这对中国城乡现行的住房权益分配制度和房产继承制度形成了冲击。近年来，城市郊区和农村“外嫁女”在拆迁安置补偿和宅基地住房权益等方面的问题屡受关注。面对家庭少子化、女性家庭角色和婚恋观念等家庭领域的新变化，管理部门未雨绸缪、做好预判并非为时尚早。

关于青年女性购房现象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国住房调查数据较少关注性别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关于女性住房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高质量数据仍相对缺乏，系统考察女性住房获得路径的变化需要更具针对性的追踪数据，以精准揭

示我国青年女性的住房获得路径。与此同时，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实行，女孩是否会因为同胞数增加，失去作为唯一子代而获得的家庭住房资源支持的机会，需要进行更广泛深入地研究。

## 参考文献

- 阿尔温·托夫勒(2006). 第三次浪潮. 上海: 中信出版社.
- Toffler, A. (2006). *The Third Wave*. Shanghai: China Citic Press. (in Chinese)
- 安居客(2020). 2020年女性置业报告. 安居客: <https://ai.anjuke.com/introduce/article/10101>. 2022年6月22日访问.
- Anjuke Institute. (2020). Women in Homeownership Report 2020. Anjuke: <https://ai.anjuke.com/introduce/article/10101>. Accessed Jun. 22, 2022. (in Chinese)
- 贝壳研究院(2021). 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 贝壳研究院: <https://research.ke.com/121/ArticleDetail?id=352>. 2022年6月22日访问.
- Beike Research Institute. (2021). Survey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s Residence (2021). Beik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research.ke.com/121/ArticleDetail?id=352>. Accessed Jun. 22, 2022. (in Chinese)
- 蔡禾、黄建宏(2013). 谁拥有第二套房?——市场转型与城市住房分化.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102-114.
- Cai, H., & Huang, J. H. (2013). Who Owns the Second Housing: On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Housing.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102-114. (in Chinese)
- 湛鸿燕(2017). 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 社会, 4: 119-142.
- Chen, H. Y. (2017). Intergenerational Accumulation and the Housing Inequality of Children: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 119-142. (in Chinese)
-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妇女研究论丛, 6: 5-15.
- ACWF. (2011). Executive Report of the 3rd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Project Group of the 3rd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6: 5-15. (in Chinese)
- 杜本峰、黄剑焜(2014). 城市青年住房分层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 9: 67-77.
- Du, B. F., & Huang, J. K. (2014).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Urban Youth's House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the Ascribed Factors and Self-actualized Factors.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9: 67-77. (in Chinese)
- 段塔丽(2008).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中被“边缘化”问题探讨.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22-128.
- Duan, T. L. (2008). An Exploratory Discussion on the Lateralization of Rural Females in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Resources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22-128. (in Chinese)
- 费孝通(1983).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7-16.
- Fei, X. T. (1983). Elderly Support in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7-16. (in Chinese)
- 风笑天(2011). 家安何处: 当代城市青年的居住理想与居住现实.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1: 73-81.
- Feng, X. T. (2011). Dream vs Reality: An Analysis of Urban Young Adults' Housing Issues.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73-81. (in Chinese)
- 高小贤(2005). “银花赛”: 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社会学研究, 4: 153-171.
- Gao, X. X. (2005). "Yinhua Match": The Sex Division of Rural Women in 1950s. *Sociological Studies*, 4: 153-171. (in Chinese)
- 金一虹(2010). 流动的父权: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4: 151-165.
- Jing, Y. H. (2010). Mobile Paternal Authority: Change in Migrant Farmer Families. *Sociological Studies*, 4: 151-

165. (in Chinese)
- 李春玲 (2019).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 *社会学研究*, 3: 1-24.
- Li, C. L. (2019). Children Born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New Generation and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 Studies*, 3: 1-24. (in Chinese)
- 李丽梅、杨澜 (2020). 自己的房子: 中国城镇女性住房路径分析, 中国妇女网: <http://www.cnwomen.com.cn/2020/11/10/99212374.html>. 2022年6月22日访问.
- Li, L. M., & Yang, L. (2020). Owning Your Own House: An Analysis of Women's Housing Pathways in China's Cities and Towns. *Women of China*; <http://www.cnwomen.com.cn/2020/11/10/99212374.html>. Accessed Jun. 22, 2022. (in Chinese)
- 李小云、董强、刘晓茜、吴杰 (2006). 资产占有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妇女研究论丛*, 6: 28-32.
- Li, X. Y., Dong, Q., Liu, X. Q., & Wu, J. (2006). Gender Inequality in Capital Assets and Poverty.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6: 28-32. (in Chinese)
- 连玉君、廖俊平 (2017). 如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35(6): 97-109.
- Lian, Y. J., & Liao, J. P. (2017). How to Test the Difference of Coefficients Between Groups after Group Regression?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35(6): 97-109. (in Chinese)
- 刘泽云 (2004). 教育投资收益分析: 基于中国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分析.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Liu, Z. Y. (2004).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Wage Incom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刘祖云 (2006). 发展社会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Liu, Z. Y. (2006). *Development Sociolog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 (2011).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社会学研究*, 2: 182-216.
- Ma, C. H., Shi, J. Q., Li, Y. H., Wang, Z. Y., & Tang, C. (2011). Family Change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Main Trends and Latest Findings. *Sociological Studies*, 2: 182-216. (in Chinese)
- 闵学勤 (2011). 空间拜物: 城市青年住房消费的仪式化倾向. *中国青年研究*, 1: 36-41.
- Min, X. Q. (2011). Spatial Worship: The Ritualistic Tendency of Urban Youth Housing Consumption. *China Youth Study*, 1: 36-41. (in Chinese)
- 聂晨、薛嘉成 (2019). 性别视角下青年女性住房路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问题*, 9: 102-111.
- Nie, C., & Xue, J. C. (2019). Housing Pathway of Young Women Transform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Economic Problems*, 9: 102-111. (in Chinese)
- 卿石松 (2017).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责任与劳动参与模式研究. *社会科学*, 11: 91-100.
- Qing, S. S. (2017). Gender Role Attitude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Femal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1: 91-100. (in Chinese)
- 卿石松 (2019). 中国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性别角色观念的经验分析. *社会学研究*, 1: 106-131.
- Qing, S. S. (2019). Social-Cultural Roots of Gender Income Differenc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Gender Role Attitudes. *Sociological Studies*, 1: 106-131. (in Chinese)
- 孙立平 (2007). 高房价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新远见*, 9: 124-127.
- Sun, L. P. (2007). High Housing Price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nk Tank*, 9: 124-127. (in Chinese)
- 唐灿 (2005). 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浙江学刊*, 2: 202-209.
- Tang, C. (2005).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Societies.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 202-209. (in Chinese)
-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 (2009).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社会学研究*, 6: 18-36.
- Tang, C., Ma, C. H., & Shi, J. Q. (2009). Ethic and Fairness of Daughter's Supporting to Her Parents' Family: Gender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 in Rural Areas of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Sociological Studies*, 6: 18-36. (in Chinese)
- 王晶、杨小科 (2017).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2: 140-155.
- Wang, J., & Yang, X. K. (2017). A Study of the Division of Family Care and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he Second Chil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140-155. (in Chinese)

- 王善高、周应恒、严斌剑 (2019). 经济独立对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 40(2): 111 - 122.
- Wang, S. G., Zhou, Y. H., & Yan, B. J. (2019).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on Women's Marital Happiness.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0(2): 111 - 122. (in Chinese)
- 魏钦恭、张佳楠 (2021). 来自兄弟的“让渡”和母亲的“馈赠”: 校外教育投入中的女孩占优现象与家庭偏好逻辑. *社会*, 5: 208 - 242.
- Wei, Q. G., & Zhang, J. N. (2021). "Concession" from Brothers and "Gift" from Mothers: Predominance of Girls in After-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Logic of Family Preference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 208 - 242. (in Chinese)
- 魏万青、高伟 (2020). 经济发展特征、住房不平等与生活机会. *社会学研究*, 4: 81 - 103.
- Wei, W. Q., & Gao, W. (2020). Economic Development, Housing Inequality and Life Opportunities. *Sociological Studies*, 4: 81 - 103. (in Chinese)
- 吴开泽 (2016).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社会*, 1: 213 - 240.
- Wu, K. Z. (2016). Research on Urban Resident's Second Set Acquisition from Life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 213 - 240. (in Chinese)
- 吴开泽、魏万青 (2018). 住房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青年住房获得——基于住房生涯视角和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的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2: 36 - 61.
- Wu, K. Z., & Wei, W. Q. (2018). Housing Reform and Housing Acquisition for Chinese Urban Youth: Research on Housing Career Perspective and Discrete: Time Event History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36 - 61. (in Chinese)
- 吴小英 (2002). “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 6: 119 - 127.
- Wu, X. Y. (2002). The Experience and Value of the "Other": An Attempt at Western Feminist Sociolog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119 - 127. (in Chinese)
- 徐佩玉 (2019). 中国一二线城市女性购房者快速增加——楼市“她需求”走强. 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19/05-02/8825993.shtml>. 2022年6月22日访问.
- Xu, P. Y. (2019). The Rapid Increase of Female Homebuyers in First and Second-tier Cities in China "Her Demand" in the Property Market Is Strong. *China News*: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05-02/8825993.shtml>. Accessed Jun. 22, 2022. (in Chinese)
- 杨菊华 (2017). 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 *开放时代*, 3: 12 - 26.
- Yang, J. H. (2017). Fertility Policy and Family Change in China. *Open Times*, 3: 12 - 26. (in Chinese)
- 杨菊华 (2019).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人口研究*, 1: 36 - 51.
- Yang, J. H. (2019). "Double Penalty of Gender and Motherhood"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1: 36 - 51. (in Chinese)
- 杨小科、王晶 (2018). 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与家庭住房投资——基于CSS(2006—2015)五轮调查数据的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2: 73 - 89.
- Yang, X. K., & Wang, J. (2018). Urban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Household Housing Asset Investment: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2006 - 2015).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73 - 89. (in Chinese)
- 叶华、吴晓刚 (2011).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社会学研究*, 5: 153 - 177.
- Ye, H., & Wu, X. G. (2011). Fertility Decline and the Trend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5: 153 - 177. (in Chinese)
- 於嘉、谢宇 (2019).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人口研究*, 5: 3 - 16.
- Yu, J., & Xie, Y. (2019).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5: 3 - 16. (in Chinese)
- 张艳霞 (2006). 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中女孩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对独生子女父母育儿观的调查与分析. *中州学刊*, 3: 131 - 133.
- Zhang, Y. X. (2006). Gender Role Socialization of Girls in Only-Child Family Contexts: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arenting Perspectives of Only-Child Parents.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3: 131 - 133. (in Chinese)

- 郑磊 (2013). 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 *社会学研究*, 5: 76 - 103.
- Zheng, L. (2013). Sibling Sex Composition, Intrafamil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 Explanation of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5: 76 - 103. (in Chinese)
- 郑筱婷、陆小慧 (2018). 有兄弟对女性是好消息吗?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经济学(季刊)*, 1: 277 - 298.
- Zheng, X. T., & Lu, X. H. (2018). Is It Good to Have a Brother for a Female? A Study 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Family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 277 - 298. (in Chinese)
- 钟晓慧 (2015). “再家庭化”: 中国城市家庭购房中的代际合作与冲突. *公共行政评论*, 1: 117 - 140.
- Zhong, X. H. (2015). Refamilization: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in Housing Consumption among Chinese Urban Famili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117 - 140. (in Chinese)
- 钟晓慧、何式凝 (2014). 协商式亲密关系: 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 *开放时代*, 1: 155 - 175.
- Zhong, X. H., & Ho, S. Y. (2014). Negotiative Intimacy: Expectation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ilial Piety among Only-child Parents. *Open Times*, 1: 155 - 175. (in Chinese)
- 周华林、李雪松 (2012). Tobit 模型估计方法与应用. *经济学动态*, 5: 105 - 119.
- Zhou, H. L., & Li, X. S. (2012). Tobit Model Estim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05 - 119. (in Chinese)
- 朱斌、李路路 (2015). 独立与权利: 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 *社会*, 5: 218 - 240.
- Zhu, B., & Li, L. L. (2015). Independence and Righ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Feminist Movements and Gender Equality.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 218 - 240. (in Chinese)
- 朱迪 (2012). “80后”青年的住房拥有状况研究——以985高校毕业生为例. *江苏社会科学*, 3: 63 - 68.
- Zhu, D. (2012). A Study on Homeownership Status of “Post-80s” Youth: A Case Study of 985 College Graduates.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3: 63 - 68. (in Chinese)
- Becker, G. S. (1993).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W., Deurloo, M. C., & Dieleman, F. M. (1994). Tenure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Micro-level Family and Macro-level Economic Shifts. *Urban Studies*, 31(1): 137 - 154.
- Dougherty, C. (2005). “Why Are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High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0(4): 969 - 988.
- Eagly, A. H. (1978). Reporting Sex Dif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7): 1091 - 1102.
- Izuhara, M., & Forrest, R. (2013). “Active Families”: Familization, Housing and Welfare across Generations in East Asia”.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7(5): 520 - 541.
- Kennett, P., & Kamwah, C. (2010). *Women and Housing: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 Pascall, G., & Sung, S. (2007). *Gender and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From Confucianism to Gender Equality*.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Press.
- Psacharopoulos, G., & Patrinos, H. A. (200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Education Economics*, 12(2): 111 - 134.
- Shang, J. W., & Zhang, X. B.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 - 564.
- Tsui, M., & Rich, L. (2002). The Only Child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Girls in Urban China. *Gender & Society*, 16(1): 74 - 92.
- Wang, M. Q. (2018). Rigid Demand: Economic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in China's Urban Housing Market. *Urban Studies*, 55(7): 1579 - 1594.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 Accessed Jun. 22, 2022.
- Yang, Z., & Chen, J. (2014).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Housing Policy in Urban China*. Berlin: Springer.

责任编辑: 朱亚鹏